

論馮道的生涯 *

——兼談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邊緣與核心

陸揚

五代政治人物中，很少能在知名度上超過馮道。他在亂世中屹立不倒的能力讓他成為許多後世人眼裏的奇蹟，也使他的名聲為此付出了代價。自宋代起，馮道逐漸淪為士大夫筆下缺乏政治廉恥的典型，但希望能揣摩出他成功祕訣的仰慕者也比比皆是。他是為數不多能吸引現代史家注意的五代人物。20世紀以來，有關馮道的討論從未間斷，其中為他翻案或甚至對他讚譽有加的也不乏其人，但大多數仍將重心放在分析他的政治倫理上，或者依據粗略的五代史框架去做“同情之瞭解”。這中間偶有例外，比如王賡武在1962年發表了《馮道：論儒家的忠君觀念》，這篇收入芮沃壽和杜希德編的著名論文集《儒家人格》的文章¹，最早對馮道的思想做較為全面的考察，至今仍是研究馮道必須閱讀的論述。1966年，礪波護出版了《馮道——亂世の宰相》²，這雖是部面向日本知識大眾的歷史傳記，卻有相當高的水準，不僅細節體現出專業史家的細緻和精確，對於馮道經歷的歷史過程中的重要環節也有獨到的把握。王賡武和礪波護的研究之所以能經受時間的考驗，關鍵是他們對唐五代的歷史有系統的研究和貫通的理解。

然而在馮道的研究中，有幾個問題卻仍然未得到重視。作為一位在唐後期相對封閉的幽州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地方文士，馮道為何能進入五代的政治核心並成為這一時期精英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仕宦生涯的成功究竟是否如一般理解的那樣是個異數甚至奇蹟？他和當時其他政治精英有何差別？本文的目的是要為這些問題提供一個初步的答案。解答這些問題同時也是為了思考一個更宏大的課題，即唐後期發展起來的主流政治文化，其核心與邊緣的交集究竟在哪裏？要解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先從河北特別是幽州地區自中唐以後的特定環境與士人的形態入手，看看8世紀後期到10世紀初，那一地區的文士與唐代的主流文化的關係，大致經歷了怎樣的變化過程？

一、晚唐五代幽州的文士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唐代中期以後河北實際呈現一種相對封閉的狀態，這種封閉並不意味著河北的藩鎮已經終止與唐廷的互動，而是說河北藩鎮出現的種種現象更多地要從其內部的政治和體制來理解。對這種封閉狀態的解釋歷來有兩種，一種是從陳寅恪等學者開始的，強調該區域趨於胡化而導致和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在文化上的根本對立；另一種則是日野開三郎等從唐代軍事職業化和藩鎮體制的角度去強調河北的特殊性。雖然以筆者個人看來，後一種觀點的論證比較綿密，陳寅恪的“胡化說”仍享有較大的號召力。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討論唐代胡化現象時，分別舉出韓愈

* 本文屬於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晚唐五代社會文化的轉型”（項目批准號：12JJD70009）成果。

¹ Wang Gungwu, “Feng Tao: An Essay on Confucian Loyalty”, in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23-145.

² 礪波護《馮道——亂世の宰相》，中央公論社，1966年。

《送董召南遊河北序》，關於李益入幽州劉濟幕的記載和杜牧《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等文字，說明當時“長安文化區域內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時惟有北走河朔之一途”，因為“河朔及其藩鎮與中央政府之問題，其核心實屬種族文化之關係也”³。陳寅恪的這一論斷不斷受到學界的挑戰和修正。近年隨著新資料的湧現以及黃永年、榮新江、森部豐等學者的相關研究，唐史界對“胡化”的理解已不再停留在陳先生時代的層次上。不過此處的重點不是要討論河北的封閉性究竟根緣在何處，而是要指出陳先生採用的韓愈等人的文字並不能用來證明他的“胡化”觀點，而只能說明在經過安史之亂後三四十年的動蕩期，從8世紀末開始，即便是政治和文化上相對隔離的河北也出現了明顯的朝廷主流文化的滲透，以至於以科第仕進為目的的中原文士，失意之後，願意去河朔尋求機會。當時的河北誠然有不同的價值觀和風俗，但這與來自長安的政治文化的影響同時存在。作於貞元十八年（802）的《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裏，柳宗元說：

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嶽，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屠之事者，比比有焉。⁴

這段話固然有點誇張，但多少反映了河北地區出現的這種微妙的轉向。在河北諸鎮中，幽州的情況最為特別。作為安史之亂的發源地，幽州和長安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十分鮮明。但同時由於空間的阻隔，自貞元元年後，以幽州為中心的盧龍和朝廷的直接衝突相對較少。陳寅恪用李益入幽州劉濟幕作為河北文化迥別於長安的證據，其實劉濟不僅是幽州節度使中最好文學的一位，也“最務恭順，朝獻相繼”⁵，和朝廷的互動最多。因此李益這樣的著名文士纔會去投奔。不僅李益，出生於關中的詩人王建也在貞元十四、五年間入劉濟幕⁶。王建的入幕背景與李益可能極為相似，都是貞元末期仕途阻塞的結果，而幽州劉濟又是位不同尋常的獎挹文士的節度使。

但是在9世紀大部份時間裏，對於長安的士大夫而言，河北特別是幽州近於化外之地，這一刻板印象隨著以長安的核心的清流政治文化的形成而得到加強。這種印象最生動誇張的表述就是杜牧對秀才盧需的描寫：

秀才盧生名需，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球飲酒，策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鬥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鎮人敬之，呼為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學之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以燕、趙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京有天子，公卿、士人哇居兩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產，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為先王儒學之道，可得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爭殺戮。”生立悟其言，即陰約母弟雲，竊家駿馬，日馳三百里，夜抵襄國界，舍馬步行，徑入王屋山，請詣道士觀。道士憐之，置之門外廡下，席地而處。始聞《孝經》、《論語》。布褐不襪，捽草為茹，或竟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日閑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間士人稍稍知之。

³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收入《陳寅恪先生論集》，中研院史語所特刊之三，1971年，125-126頁。

⁴ 《柳宗元集》卷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668頁。關於此文撰寫的時間，見陶敏、李一飛、傅璇琮《唐五代文學編年史·中唐卷》，九州出版社，1998年，588頁。

⁵ 《舊唐書》卷一四三《劉怱傳附濟傳》，中華書局，1975年，3900頁。

⁶ 陶敏、李一飛、傅璇琮《唐五代文學編年史·中唐卷》，551-552、556頁。

杜牧將來自燕趙的盧需作為當時河北士人的典型，用一種類似縱橫家的口吻來鋪敘這位文士到唐代核心區域後的文明開化的過程，但其中包含了杜牧本人的諸多想像。據杜牧，盧需的父祖輩都曾在燕趙地區的涿州易州和鎮州任官，正是本文關懷的對象馮道成長的地區。杜牧本人並無涉足燕趙的記錄，他的這種印象很可能得自類似下面這種重大衝突事件的解說：

（張）弘靖之入幽州也，薊人無老幼男女，皆夾道而觀焉。河朔軍帥冒寒暑，多與士卒同，無張蓋安輿之別。弘靖久富貴，又不知風土，入燕之時，肩輿於三軍之中，薊人頗駭之。弘靖以祿山、思明之亂，始自幽州，欲於事初盡革其俗，乃發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從事有韋雍、張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常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呵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詬責吏卒，多以反虜名之，謂軍士曰：“今天下無事，汝輩挽得兩石力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意氣自負，深恨之。⁷

長慶元年朝廷委派重臣張弘靖接替劉總為幽州節度使，上任不久便引發鎮兵動亂，造成朝廷對幽州節度使委任權在短時間內得而復失，也導致憲宗以來朝廷壓制藩鎮力量的雄心的萎頓。上引段落雖然出自五代編的《舊唐書》，但其中的敘述和解說必然出自當年杜牧接觸到的《穆宗實錄》一類官方記載。這一事件向來被當作唐後期燕薊驕悍、輕文少禮的證明，其實這樣的結論失於簡單。首先這是在事件發生之後的一種帶著官方色彩的解釋，具有強烈的“怪罪遊戲”（blame game）傾向。張弘靖和他的僚佐韋雍等人也許真不瞭解當時燕薊軍事化的風習（這一指責其實還是缺乏充分證據的），但他們與當地人的隔閡和衝突與其說是文與武兩種價值觀對立的結果，不如說是一種特殊的長安清流文化和幽州地方傳統和風習的衝突，也就是說，對嗜酒醉飲、燭火滿街等行文的反感並不能用來證明幽州地區完全排斥文的傳統。此外，張弘靖的一些舉措，比如發安祿山墓等等，也不僅僅是儒家士大夫意識中必要的移風易俗的慣性思維所致，而是朝廷確立權威的象徵性一步⁸。

事實上在河北諸鎮中，幽燕地區的文化積澱最深厚，內容也最豐富。除了詩書傳統的不絕如縷，當地始終是整個唐帝國佛教文化的盛地。即便處於割據狀態達百數十年之久，幽州依然是河北地區文人的主要產地。在唐後期，由於幽州與唐中央的隔閡，當地文士很少進入主流士大夫的視野，所幸唐代墓誌為我們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個案。比如死於會昌五年（845）的王時邕，曾祖王洪是瀛洲錄事參軍，祖父王解公五經及第，官涿州范陽縣丞，父親王杲也是五經及第，先任瀛洲河間縣主簿，後至幽州功曹參軍。幾乎可說是馮道的鄉人。應該說王時邕的父祖輩已經參與了唐代的科舉，雖然只是明經及第。但這些積累顯然為王時邕提供了進一步爭取科第成功的條件。墓誌說他“幼學在志”，“兼富詞采”，並且“辭田園，赴春闈。已行及離鄉千里，而遇德音。如得坎而止，增益厥道。旅遊一十五祀，是以驟馳鄉思而懷歸焉。”可見經過長達 15 年的漫長歲月，王時邕舉進士的努力終告失敗，不得不回到故鄉。值得注意的是當他投效盧龍軍府時，卻“從事軍門”，“首署佩刀之職”，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武官，連婚姻對象都是武將之女⁹。

⁷ 《舊唐書》卷一二九《張延賞傳附弘靖傳》，3611 頁。這裡的敘述應該取自《穆宗實錄》等唐代官修史乘。

⁸ 關於安史父子在河北的象徵意義與唐廷的反應，見黃永年《論安史之亂的平定和河北藩鎮的重建》，收入氏著《唐代史實考釋》，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226-228 頁。

⁹ 《唐故幽州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太原王公墓誌銘並序》，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會昌 029 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966 頁。

和王時邕情況有點類似的還有死於大中二年（848）薊門私第的幽州地方高級官僚王公淑：“府君諱公淑，字均。太原人也。（中略）曾祖亮，皇幽州節度衙前虞侯。祖連，皇盧龍節度要籍。烈考戡，敦詩閱禮。（中略）府君即徵君之元子也。懸弧之時，弄璋之儀，足慰九族之心，已駭四海之目。五歲從師受業，百家罔不漁獵，觀光京輦，元戎累辟。解褐幽州節度要籍。立談邊務，坐見清塵，特署盧龍節度巡官。”¹⁰顯然王公淑也是當地的一名文儒，雖是太原人，但已三代服務於范陽鎮。從他的生平經歷來看，他的確具有當地官僚的特色，也就是家庭背景中文武的界限並不清楚。他的曾祖和祖父都是武將，但到他父親這一輩，已經“敦詩閱禮”，而他更是“五歲從師受業，百家罔不漁獵”。當然墓誌中沒有特別再詳說他文學或其他學問方面的造詣，但他和祖輩趣向顯然相當不同。

在 9 世紀後期的幽州的文士中，最有名的大概要數張建章。《冊府元龜》載：“張建章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為事，經涉之地，無不理焉。建章曾齋元載命往渤海。遇風濤，乃泊其船，回及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苞麥屑置於水中，摸而讀之，不失一字，其篤學也如此。後至幽州行軍司馬。”¹¹張建章墓誌的發現，為我們瞭解 9 世紀幽州的文化生態提供很有用的資料。撰寫其墓志的張珪則是張建章之從兄，建章之弟張總章書石，張總章結銜為“前幽州節度衙前散兵馬使”¹²，顯然是武職，這說明幽州的地方官僚家族中文武界限的淡薄是普遍現象。張原本是定州人，祖上三代都在河北任職，其曾祖張閔是太府少卿充河北轉運使，祖父是定州北平縣丞知縣事，父親是涿州別駕。建章死於咸通七年。墓誌文提到：

年十六，雲水興高，風月吟苦。旋自試於秋賦，□□著名；尚持疑於春闈，琢磨益厲。大和四載，博陵歎尤，迫旨甘，乃咄嗟而謀曰：仲由負米，毛義氣捧檄，孝敬之行也。予獨何為執以厥養？違親便近，遊方至燕，既館於碣石，太保李公厚遇，縻之安次尉。

可見張建章原本是要走貢舉的道路，但不久放棄，選擇就近在幽州出仕並得到節度使李載義的賞識。以他的才華而選擇放棄科第，當然不排除墓誌中提供的那種私人原因的真實性，但更可能是受到地緣政治背景的阻礙。而在墓誌中插入的這番感嘆，表明對於晚唐燕趙一帶的文士來說，參加貢舉并取得成功是一種令人嚮往的選擇。和其他幽燕文士不同，張建章的影響遠遠超出地域的範圍，一方面是因為他有機會在大中十二年以幽州節度判官的身份到長安奏對，獲得宣宗的欣賞。一方面則是憑藉撰作的水平。張建章墓誌說他撰寫的《渤海記》“當代傳之”，並不誇張。¹³

¹⁰ 《大唐故幽州節度判官兼殿中侍御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盧龍節度留後營府都督柳城軍使平州諸軍使平媯等州刺史上柱國太原王府君墓銘並序》，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再補》卷三，中華書局，2005年，2130頁。

¹¹ 《冊府元龜》卷七九八《總錄部·勤學》，中華書局，1994年，9486頁。

¹² 《唐幽州盧龍節度押奚契丹兩蕃副使攝薊州刺史正議大夫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安定張公墓誌銘並序》，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中和007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511頁。考釋《張建章墓誌》的學術文字不少，較為細緻的當推《〈渤海記〉著者張建章〈墓志〉考》（《黑龍江文物叢刊》1981年第1期，16-22、88頁）與羅繼祖《張建章墓誌補考》（《黑龍江文物叢刊》1983年第3期，61-62頁）。此處引文的斷句及文字即據羅文改正。

¹³ 五代北宋的名臣王溥之子王貽孫就仔細讀過，見《宋史》卷二五五《王溥傳附王貽孫傳》，中華書局，1977年，8802頁。《新唐書》卷219《渤海傳》也多取材於此書，見金毓黻《渤海國志長編》卷一九《叢考》。

隨著科舉地位的不斷上昇，致力於科舉的河北士子日益增加。劉琴麗的研究認為，隨著憲宗朝以後朝廷與河北藩鎮關係的緩和，有越來越多的河北士子取得了貢舉資格¹⁴。這一趨勢說明當地對朝廷主流文化的接受程度的增加。但無論是王時邕還是張建章，幽州文士在 9 世紀末以前，始終無法突破地緣政治的局限，在國家科第中實現真正的突破。事實上整個河北地區只有唐末的公乘億是唯一在進士科第中取得成功的當地人士，但也同樣經過長期的努力。這種情況如果和偏遠而且文化發展較晚的閩中地區相比，差別就非常大了，後者在晚唐進士科第中頻現成功¹⁵。河北黯淡的貢舉記錄固然是因為進士科第日益為長安的清流官僚家族所壟斷，對於來自河北的士子必然不加以重視，但同時河北藩鎮本身的自我控制也給士子帶來阻礙。媯州刺史劉鈐死於文德元年，他的墓誌告訴我們：“十五察孝廉，二十舉茂才。揮譚操觚，綽有餘裕，迫藩侯之命，不得與計吏偕。”¹⁶ 劉鈐的祖父和父親都是盧龍兵馬使這樣的上層武將，他卻因迫於藩侯之命而難以取得貢士的身份，只能投身軍門。河北藩帥的這種阻撓很可能是一種象徵性手段，以表示河北的獨立身份。對於河北士人而言，科舉幾乎是他們能打破地域的藩籬而進入全國性的政治舞臺的唯一途徑。可是只有到唐廷權威趨於瓦解之時，這種突破纔真正的實現了。長期儲備在燕地的文士立刻成為各方諸侯竭力爭取的對象。《舊五代史》卷六〇《王緘傳》：

王緘，幽州劉仁恭故吏也。少以刀筆直記室，仁恭假以幕職，令使鳳翔。還經太原，屬仁恭阻命，武皇留之。緘堅辭復命，書詞稍抗，武皇怒，下獄詰之，謝罪聽命，乃署為推官，歷掌書記。從莊宗經略山東，承制授檢校司空、魏博節度副使。緘博學善屬文，燕薊多文士，緘後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驟達。¹⁷

這段文字中的“燕薊多文士”是晚唐以來實際情況的反映。與此同時，唐末河北諸鎮的節度使幾乎都呈現出好文的傾向，比如易定的王處直、王都，魏博的樂彥禎和羅紹威，成德的王鎔等等。相比之下，幽州的統治者劉仁恭就遜色很多，尤其是在他兒子劉守光統治期間，幽州飽受摧殘，人材大量流失，很多逃亡河南河東，為李克用和朱溫集團所籠絡。除了王緘，還有同樣著名的刀尺之才馬郁，據《冊府元龜》記載：“馬郁，幽州人。劉仁恭入燕，用為掌書記。唐天祐元年，汴人寇滄景。仁恭求援於武皇。武皇徵其兵，同攻潞州。仁恭遣郁與監軍張居翰，率師數萬赴會。澤潞既平，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兄守文又失滄景。乃留郁不遣，署為副留守，累官至檢校司空秘書監。武皇與莊宗禮遇俱厚，歲時給賜優異。”¹⁸ 有的則為勢力日益強大的契丹所吸收，比如阿保機的重要謀臣韓延徽就是幽州安次人士。

上文在討論王時邕、張建章等例子時提到河北的文士或儒士，常需要跨越文武的界限，在仕途上做兩手準備。這種情形在唐末五代依然存在。比如《舊五代史·張希崇傳》：

¹⁴ 關於現存史料中河北藩鎮士子貢舉情況的分析，見劉琴麗《由科舉仕進看中晚唐河北藩鎮的地域文化》，《唐代舉子科考生活研究》附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¹⁵ 參見凍國棟《唐代閩中進士登場與文化發展管見》，原刊《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1期（1991年），收入氏著《中國中古經濟與社會史論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322-339頁；陳弱水《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階層興起的幾點觀察》，收入氏著《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357-391頁。

¹⁶ 《唐故幽州媯州刺史充清夷軍營田等使朝散大夫檢校司封郎中攝御史中丞上柱國彭城劉公墓誌銘並序》，《唐代墓誌彙編續集》文德001號，1151頁。

¹⁷ 《舊五代史》卷六〇《王緘傳》，中華書局，1976年，805頁。

¹⁸ 《冊府元龜》卷七二九《幕府部·辟署》四，8679頁。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縣人也。父行簡，假薊州玉田令。希崇少通左氏春秋，復癖於吟詠。天祐中，劉守光為燕帥，性慘酷，不喜儒士，希崇乃擲筆以自效，守光納之，漸升為裨將。俄而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鎮其地，希崇以舊籍列於麾下，尋遣率偏師守平州。案：歐陽史作劉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為偏將，將兵守平州。是守光未敗即守平州，非為德威所遣也，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阿保機南攻，陷其城，掠希崇而去。阿保機詢希崇，乃知其儒人也，因授元帥府判官，後遷盧龍軍行軍司馬，繼改蕃漢都提舉使。¹⁹

這位“希崇素樸厚，尤嗜書，蒞事之餘，手不釋卷”的儒者固然為了出仕不得不投筆從戎，但他顯然擁有軍事方面的能力。

出身於幽燕而為唐末五代各政權網羅的文士有一個普遍的特點，即出眾的詞學之才，而其政治生涯的發展，憑藉的主要也是這一才能以及因之而獲得的聲譽。關於這一世變時期霸府負責文翰的掌書記的重要性及其必備的素質，吳麗娛的論述最為詳盡²⁰。這一現象的出現，即所謂“自廣明大亂之後，諸侯割據方面，競延名士，以掌書檄”²¹，正是馮道進入歷史視野的前提。

二、馮道生涯的締造

以上討論旨在說明，9世紀中後期，唐廷倡導的以文為核心的主流文化已日益滲入河北，而原先河北自身的文化傳承也沒有因藩鎮武人力量的強大而中斷。這一傳統主要是以私人傳授和鄉校的方式得以延續，內容中儒學或經學所佔的比重應該較大，當然文字能力也沒遭到忽視。地方傳統與主流文化碰撞的結果使河北士人越來越頻繁地參與到以長安為中心的科舉和書寫文化的實踐中。但從王時邕、張建章、公乘億和司空頌等人參加貢舉的例子可以看出，這一過程在晚唐仍是緩慢的，而且也並不成功。但隨著唐廷清流文化的影響力日漸擴展並受到河北統治集團的重視，加上唐廷政治權威的的瓦解，河北藩鎮從相對孤立的狀態中解脫出來，同時成為五代前期北方李克用、朱溫的爭霸中決定勝負的關鍵，這些因素結合為河北地方文士造就了更多進入核心文化的契機和更為廣闊的政治活動舞臺。而幽州這個原本河北文化傳統最為深厚的區域又因當地軍閥的野心而導致大亂，促使該地有抱負的士人大量外流。馮道的政治生涯就是在這一背景下開始的。

馮道耕讀之家的出身背景和“儒者”的身份，不僅史料記載清楚，學界的討論也很充分。馮道的生涯之所以對我們瞭解五代政治精英的形成很有幫助，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既有鮮明的鄉土意識和網絡，又成為晚唐以來主流文化的一個代表性人物。他與河北特別是幽州地域關係的密切可以從多方面看出，這一點下文還將涉及。王賡武注意到馮道成長的瀛洲景城雖在幽州節度轄下，但地處該鎮邊陲，唐末為三方諸侯征戰之地，這樣的環境會讓馮道更善於應付五代的亂世。比如馮道10歲時該地就發生過大規模兵變，而鎮壓這次兵變成功的景城令恰是日後統治盧龍的劉仁恭²²。王賡武推測劉仁恭曾

¹⁹ 《舊五代史》卷八八《張希崇傳》，1147頁。

²⁰ 吳麗娛《唐禮摭遺》第四章《唐五代表狀箋啓書儀》，商務印書館，2002年，87-130頁。

²¹ 《舊五代史》卷六〇《李襲吉傳》，805頁。

²² Wang Gungwu, “Feng Tao: An Essay on Confucian Loyalties”, p. 125.

和馮道家族捻熟，馮道後來在劉仁恭之子劉守光下獲得第一個職位或許和劉守光的介紹有關，這是個有價值的推測。

根據現存記載，馮道仕宦生涯的肇始得力於三位人物，他們是幽州的軍閥劉守光，唐末的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和投身李克用的中朝士族子弟盧質。這三人對馮道仕途的影響程度當然不一，但馮道受到這三人的賞識並非純屬偶然。劉仁恭劉守光父子是唐末五代河北最為殘虐的武人節度使，但與其他河北蕃帥一樣，劉氏父子也需要文士的協助。劉守光之用馮道和上文提到的劉仁恭之用馬郁、王緘類似，也說明劉守光不是全無見識，只是他對待文士（或儒者）的惡劣態度和幽州日益惡化的環境導致馮道的離去。馮道當時的際遇其實並不特殊，同時有兩位和馮道背景極為相似且同樣來自幽州的士人在類似境況下殊途同歸，後來成為馮道生涯中最重要同僚，他們就是劉昫和趙鳳。《舊五代史》卷一五《劉昫傳》：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祖乘，幽府左司馬；父因，幽州巡官。昫神彩秀拔，文學優贍，與兄暉、弟暉，俱有鄉曲之譽。唐天祐中，契丹陷其郡，昫被俘至新州，逃而獲免。後居上國大寧山，與呂夢奇、張麟結庵共處，以吟誦自娛。會定州連帥王處直以其子都為易州刺史，署昫為軍事衙推。及都去任，乞假還鄉，都招昫至中山。會其兄暉自本郡至。都薦於其父，尋署為節度衙推，不踰歲，命為觀察推官。歷二年，都篡父位。時都有客和少微素嫉暉，搆而殺之，昫越境而去，寓居浮陽，節度使李存審辟為從事。莊宗即位，授太常博士，尋擢為翰林學士。²³

劉昫來自典型的唐後期幽州地方官僚家庭，他的父祖輩的仕途雖因幽州的特殊境況而局限於當地，但也因此積累了地方資源。就地位論，劉昫家族應在馮道家族之上，且兄弟均以文才著稱，更具備地域型文官家族的特徵。《劉昫傳》說他曾入山中過著文學隱士的吟誦生活，實際情況是他為躲避劉守光的暴政而逃身於山中僧舍²⁴。有意思的是，劉氏兄弟在當時的離亂中，各自運命不同。劉暉在太原附近被梁軍俘獲，隨後效力於後梁政權多年²⁵。上段文字中劉昫藏身的“上國大寧山”據《冊府元龜》當作“上谷大寧山”²⁶，即今日之易縣泰寧山。易定節度使王處直和他的養子王都是唐末河北藩鎮節度使中重視文士的典型。當易定節度使王處直將他信任的養子屬為易州刺史時，已在該地的劉昫自然成為王處直或王都延攬的對象。劉昫先在王都下任軍事衙推。王都離任回定州後又將他招到定州，而劉暉也來加入。王都將劉昫推薦給王處直，不久劉昫成為王處直的僚佐。但此後他們兄弟的命運就遭遇到重大改變。後梁龍德元年（921），王都兵變囚禁王處直，成為易定節度使。王都的親信和少微因嫉妒而導致劉暉冤死，劉昫因此投奔李克用集團。關於和少微的生平我們所知很少。史料中關於和少微的事跡最重要的是他幫助王都策劃了囚禁王處直的政變。通過考古發現的《王處直墓誌》正出自其手。這方墓誌作於王處直被鳩死之後，是王都授意下的產物，說明正史有關和少微在易定受代中的

²³ 《舊五代史》卷八九《劉昫傳》，1171-1172頁。

²⁴ 《冊府元龜》卷八六五《總錄部·報恩》（10277頁）：“劉昫，開運初為相。先是避難河朔，匿於北山蘭若，有賈少瑜者，為僧，輟衾袍以溫煖之。及煦宦達，致少瑜進士及第、監察御史，聞者義之。”（此事亦見《舊五代史·劉昫傳》，1173頁）劉昫晉開運元年七月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舊五代史》卷八三《晉書·少帝紀》，1094頁）。此處沒有明確說劉昫是否出家為僧，但下文提到的賈少瑜和趙鳳、曹國珍當時都削髮為僧。

²⁵ 《舊五代史》卷一三一《劉暉傳》，1721頁。傳中說：“暉少離鄉里，唐天祐中，梁將劉鄩襲太原，軍至樂平，時暉客於縣舍，為鄩軍所俘。”樂平為山西太原府屬縣。毫無疑問當時劉暉和許多幽州人士一樣，去太原謀求出路。

²⁶ 《冊府元龜》卷九四九《總錄部·逃難》二，11173頁。

角色的記載較為可信。從墓誌文字判斷，和少微固然有文才，但不能說非常特出²⁷。他和劉暉劉昫之間的衝突的原委細節難現無從知曉，但和少微要置對方於死地則說明彼此的衝突涉及他的切身利益。王都篡位成功，和少微的地位必然隨之上昇，但劉昫早已是易定幕府高級僚佐，兄弟二人無論名望、資歷還是文才都應在和少微之上。且王都是他們的舉薦人，不難想象在篡位之際他更試圖籠絡劉氏兄弟。和少微即便是王都親信，要想立刻超越劉氏兄弟成為易定文職僚佐之首或霸府書記這類關鍵職位也未必容易。和少微這樣一個有野心的地方文士決定下手除去競爭對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史料顯示和少微長期把持王都的幕府，對潛在的競爭者必欲除之而後快²⁸。這些固然說明當時河北藩鎮內部鬥爭的激烈，但這個例子也和上節討論過的韓延徽與王緘的衝突一樣，從一個側面也說明實際政治中“文”的作用正在擴大，成為地方士人最重要的進身資源。

接下來再看趙鳳的情況。《舊五代史·趙鳳傳》：

趙鳳，幽州人也。少為儒。唐天祐中，燕帥劉守光盡率部內丁夫為軍伍，而黥其面，為儒者患之，多為僧以避之，鳳亦落髮至太原。頃之，從劉守奇奔梁，梁用守奇為博州刺史，表鳳為判官。²⁹

趙鳳和馮道、劉昫一樣具有“儒者”的身份，但他不得不為避軍役而削髮為僧的舉措說明他屬於普通士人³⁰。趙鳳最初也是為了躲避幽州暴政而到太原，只是隨劉守奇的離去暫時效命於朱溫集團。趙鳳的文才和馮道應相當，這點下文再涉及。但他比馮道更為敢言，一生行事立場分明。《舊五代史》的傳記說他“性豁達，輕財重義”，看來是有根據的。趙鳳的俠義和馮道的持重，風格雖不同，卻都受到幽燕土壤的深厚影響。

對馮道政治生涯的順利發展影響最大的，是成為李克用重要輔佐的原唐河東監軍使張承業。筆者已在他處討論過中晚唐宦官集團在維繫唐廷政治權威中扮演的積極角色，這裏要補充說明的是越到了唐代末期，宦官作為唐廷權威的象徵的意味就越濃厚，當時的世人對此的認知遠比後來的史家來得清楚，因此朱溫以屠殺宦官集團的方式從肉體上摧毀唐廷政治基礎。受到李克用庇護的張承業和受到劉仁恭庇護盧龍監軍使張居翰成了碩果僅存的兩位重要的監軍。張居翰最終也加入了李克用的陣營。李克用保護張承業的舉措有象徵意義，表明他悉尊唐廷，和朱溫勢不兩立。宦官制度在後唐初期的延續

²⁷ 《王處直墓誌》錄文見《全唐文補遺》第7輯，三秦出版社，2000年，166-169頁，墓誌紀錄的和少微的結銜是節度掌書記，但不清楚這究竟是他何時開始擔任的職位。關於《王處直墓誌》的文字質量，陳尚君先生曾向筆者提供他的意見，認為墓誌用的大都是常典，說明作者水準並不特出，筆者基本贊同這一看法，不過墓誌的整體結構仍有特點，比如開頭的用詞等等，至少不是很常見的手法。另外王都非泛泛之輩，屬於河北文化修養最高的節度使之一。以王處直如此重視文人，王都當不至於用水準很差的人擔任掌書記。

²⁸ 《宋史》卷二六二《趙上交傳》亦提到後唐同光中，趙上交“嘗詣中山干王都”，卻為和少微讒言所中，不得已而去。趙上交晉初成為中書舍人、知內外制，可見也是以文才知名的士人（9066頁）。

²⁹ 《舊五代史》卷六七，889頁；又見《冊府元龜》卷九四〇《總錄部·患難》，11078頁，卷九四九《總錄部·逃難》二，11172頁。

³⁰ 趙鳳不是現存歷史記載裏唯一在劉守光時期因躲避軍役而落髮遠走的幽薊文士。《冊府元龜》卷七二九《幕府部·辟署》四：“曹國珍，字彥輔。少值燕薊亂離，因落髮，被緇客於河西。延州高萬興兄弟皆好文，辟為從事。國珍嘗以文章自許，求貢禮闈，萬興飛表薦之。梁永明中，特敕進士及第。還，為萬興幕客且掌書奏。期年，入為左拾遺。”自天祐四年（907）起劉守光稱盧龍節度使。據朱玉龍《五代十國方鎮年表》（中華書局，1997年，195頁）及《冊府元龜》卷二一五《閏位部·招懷》（2574頁），高萬興始任保塞軍節度使、丹延等州安撫招誘等使在梁開平三年（909）二月，因此曹國珍落髮的時間和趙鳳正相吻合。

也具有類似保持唐代制度的性質。³¹但張承業不同尋常的能力和貢獻也是讓李克用和後來的李存勗對他無比信任的緣由。從史料記載的張承業生平看，無論割割經營還是政治膽識都有卓越表現，在晉梁爭霸戰中，幾乎兼具了楚漢時期蕭何與韓信的作用。他和張居翰的生平事業值得另文考察，這裏只著眼於與馮道生涯的關係。

張承業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為後唐事業儲備人材。他留守太原期間正值幽燕大亂，太原成了吸引避難幽州士人的投奔對象，前面提到的趙鳳和劉暉都是這種情況。而以太原為中心的晉王勢力如此重視來自幽燕的文士，部分原因是太原地區的文化資源相對薄弱，即如《舊五代史·張憲傳》說的“太原地雄邊服，人多尚武，恥於學業”。³²從史書收錄的例子看，張承業重視的幽州士人大都有器局操守且文辭優瞻。呂琦是幽州安次人，和劉昫一樣出身於典型的幽州地方官僚家庭，祖父還是瀛洲景城主簿，“唐天祐中，莊宗方開霸府，翹佇賢士，墨制授琦代州軍事判官，秩滿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重琦器量，禮遇尤厚”³³。又《舊五代史·馬郁傳》：

郁在武皇幕，累官至檢校司空、祕書監。武皇與莊宗禮遇俱厚，給賜優異。監軍張承業，本朝舊人，權責任事，人士脅肩低首候之。郁以滑稽侮狎，其往如歸，有時直造臥內。每賓僚宴集，承業出珍果陳列於前，食之必盡。案：《太平御覽》引《後唐書》作：陳列於前，客無敢先嘗者，當郁前者，食之必盡。（舊五代史考異）承業私戒主膳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至，窺其不可啖，異日，韉中出一鐵糲，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為公設異饌，勿敗余食案。”其俊率如此。³⁴

可見張承業對來自范陽的馬郁也眷顧有加。馮道只是張承業吸納的幽州人士中最為史家所知的一位。《舊五代史·馮道傳》有段關於他被張承業辟用的描述：

（劉）守光敗，遁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辟為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玄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洽，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時河東記室盧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黃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尋薦為霸府從事，俄署太原掌書記，時莊宗併有河北，文翰甚繁，一以委之。³⁵

《冊府元龜》中類似的記載把這段過程說得更戲劇化：

後唐周玄豹自言善相術，太原監軍特進張承業嘗延之。歷視諸僚佐時，巡官馮道初自燕來，性不事華潔，灰塵滿面，而以文行見知承業，命典書奏。承業問玄豹曰：“馮巡官何如？”曰：“巡官依蓮泛水，幸遇特進禮士之秋，官不逾宰百里。”承業笑曰：“他已為起居郎，公何忽耶！”³⁶

這兩段文字有渲染的成份，但勾勒出馮道進入太原這個新的政治中心在時人眼裏是何種形象。張承業起用馮道固然有亂世用人不拘一格的味道，但他重視的才能還是以文章為核心，可以說符合主流文化

³¹ 王廣武早已注意到後唐任用宦官的這種意義，見 Wang Gungwu,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06.

³² 《舊五代史》卷六九，911 頁。

³³ 《舊五代史》卷九二《呂琦傳》，1215 頁。

³⁴ 《舊五代史》卷七一《馬郁傳》，938 頁。

³⁵ 《舊五代史》卷一二六《馮道傳》，1655 頁。

³⁶ 《冊府元龜》卷九二九《總錄部·不知人》，10013 頁。

的標準，所以他更像是在遵循晚唐以來政治文化中獎掖孤進的模式。礪波護稱張承業為馮道一生中的“貴人”（patron），實為精確。上段記載也提到了盧質對馮道的推舉。盧質當時正擔任河東掌書記，是配合張承業經營河東的搭檔之一。雖然就個人背景而言，盧質出身唐代中朝清流世家，但他未追隨當時名家子弟相互援引的習慣，而推舉背景相差很遠的馮道。從後來馮道對他的態度來看，當時盧質的推舉顯然是有效的³⁷。周玄豹的情節在現代讀者眼裏可能顯得略為不經，但這一情節在此自有其敘事功用，不應輕輕放過。認為相術可以判斷一個人的生涯前景是唐代普遍的看法。其實同樣來自幽燕的周玄豹絕非一般的相士，《舊五代史》專門為之列傳，並特別提到他因憑骨相準確判斷出唐明宗的身份而名聲大噪，也見知於張承業³⁸。故而此處的描述，真正用意恐非否定相術的可靠性，而是用來批評甚至嘲弄主流文化影響下產生的浮薄的人材品鑑取向。這點上《冊府元龜》的文字更明顯。馮道擁有主流文化所要求的文筆和識見，缺乏的只是在一般人心目中代表這種文化的中朝子弟的“華潔”外表，但這種外表在實際生活中常被視作清流人物不可缺少的條件，周玄豹接受的正是此種膚淺的觀點。反倒是盧質能獨具慧眼，看出馮道的非凡來，甚至以被當時史傳稱為首唱元和中興的杜黃裳作比。

據礪波護的研究，馮道開始擔任河東節度巡官時大約 32 歲到 33 歲之間，而那時張承業已六十六、七。馮道擔任這一職位直到 38 歲³⁹。919 年李存勗回歸晉陽時，河北已基本為晉所有。馮道接替了盧質成為河東的掌書記。對此，《舊五代史·盧程傳》的記錄也頗詳細：

初，判官王緘從軍掌文翰，胡柳之役，緘歿於軍。莊宗歸寧太原，置酒公宴，舉酒謂張承業曰：“予今於此會取一書記，先以卮酒辟之。”即舉酒屬巡官馮道，道以所舉非次，抗酒辭避，莊宗曰：“勿謙挹，無踰於卿也。”時以職列序遷，則程當為書記，汝弼亦左右之。程既失職，私懷憤惋，謂人曰：“主上不重人物，使田里兒居余上。”先是，莊宗嘗於帳中召程草奏，程曰：“叨忝成名，不閑筆硯。”由是文翰之選，不及於程。時張承業專制河東留守事，人皆敬憚。舊例支使監諸廩出納，程訴於承業曰：“此事非僕所長，請擇能者。”承業叱之曰：“公稱文士，即合飛文染翰，以濟霸國，嘗命草辭，自陳短拙，及留職務，又以為辭，公所能者何也？”程垂泣謝之。⁴⁰

五代初霸府掌記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史書生動記載了公認的章表能手王緘的意外喪生給李存勗帶來的悲慟，因此馮道得以成為王緘的繼任是非比尋常的，說明李存勗和張承業對他文字能力的信任。但上述記載還告知我們這一時期的政治文化精英正在出現重組，和張承業一樣，李存勗一面接受晚唐以來重視文才，尤其是那種擅長表狀箋啟的燕許刀尺之才的觀念，一面則開始在長期壟斷這一場域的中朝名流之外尋找人材，以至遭到李氏集團中世族成員的抗議。盧程自視為“人物”，即品流甚高的中朝子弟，《新五代史·盧程傳》在這裏徑直用“門閥”替代了“人物”⁴¹。《舊五代史·盧程傳》說他

³⁷ 《舊五代史·盧質傳》特別提到盧質晚年馮道贈詩推重的事例，《舊五代史》卷九三，1228 頁。

³⁸ 《舊五代史》卷七一《周玄豹傳》，945-946 頁。

³⁹ 礪波護《馮道——亂世宰相》，75、77 頁。

⁴⁰ 《舊五代史》卷六七，887 頁。

⁴¹ 《新五代史》卷二八，中華書局，1975 年，304 頁。

“矜恃門地”⁴²。雖在一處共事，盧程可能長期視馮道為“田里兒”。這次選掌記，他得到地位甚高且屬於中晚唐最為重要的詞臣家族的成員盧汝弼的背書，因此，不難理解盧程對最終結果感到錯愕。

馮道生涯前期的一個需要面對的挑戰就是唐末清流世家人物的輕視，這是與他相關的記載中出現多次的主題。但他雖屬孤進，政治上卻不孤立。晉唐政權雖然大量接納唐廷舊臣，但從李存勗時代起，家世背景並不煥赫的新人也逐漸佔據重要職位，馮道出任掌書記就是一個重要的訊號。如果以莊宗一朝翰林學士任用來看，這一情況更加明顯。以下是唐莊宗朝翰林學士入院與出院表：

盧質	同光元年夏四月以河東節度判官為兵部尚書，充翰林學士承旨 唐明宗天成元年六月戊子以翰林承旨、兵部尚書、知制誥盧質為檢校司空，充同州節度使
馮道	同光元年夏四月以河東節度掌書記為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同年十月後丁父憂； 同光三年十月丙子，以前翰林學士、戶部侍郎依前本官充職 唐明宗天成元年五月乙亥 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以本官充端明殿學士
盧文度	同光元年十一月丁巳以吏部侍郎、史館修撰、判館事為兵部侍郎，充翰林學士 同光二年正月十九日病逝
劉昫	同光元年四月後不久入院，十一月以翰林學士、守尚書膳部員外郎為比部郎中、知制誥，依前充職 同光三年丁母憂，服闋，授庫部郎中，依舊充職 唐明宗長興二年八月，以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守本官，充端明殿學士
馮嘉錫	同光元年十一月丁巳以右散騎常侍、充宏文館學士、判館事為戶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出院時間不詳
趙鳳	同光元年十一月丁巳以扈鑾制書學士、行尚書倉部員外郎為倉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唐明宗天成元年五月乙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以本官充端明殿學士
于嶠	同光元年十一月丁巳以左拾遺守本官，充翰林學士
李愚	入院時間在同光元年十二月與同光三年九月魏王繼岌伐蜀前 唐明宗長興元年五月辛卯，翰林承旨、兵部侍郎為太常卿

* 資料來源：《舊五代史》、《冊府元龜》。

莊宗一朝，盧質始終是地位最高的承旨學士⁴³。盧文度和李愚、馮嘉錫等都曾是後梁的翰林學士。其中尤以盧文度地位最高，他從昭宗乾寧二、三年間就入內署，雖先服務於後梁，卻在李克用集團中有不少至親，比如重臣盧汝弼是他的從叔，盧文紀是他的從弟。不過文度同光二年正月即暴病而死⁴⁴。同光年間翰林學士的構成還是以莊宗吸收的新人為主，而且最重要的三位都是幽州人士。馮道、趙鳳和劉昫的仕途可以說從此齊頭並進，馮道的生涯軌跡也只能說是這一群人中略微特出的一位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群體和來自後梁的成員關係並不見得融洽。比如明宗朝入相的李愚和馮道、趙鳳同為河北人，且在學士院共事，但他和馮、趙二人就時有矛盾。《新五代史·李愚傳》：“明宗

⁴² 《舊五代史》卷六七，887頁。

⁴³ 《舊五代史》卷二九《唐書·莊宗紀》記同光元年夏四月，“以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為兵部尚書，充翰林學士承旨”。十一月丁巳，“以吏部侍郎、史館修撰、判館事盧文度為兵部侍郎、充翰林學士”，404頁。

⁴⁴ 盧文度事跡分析見陸揚《論唐五代社會與政治中詞臣與詞臣家族——以新出石刻為例》，《北京大學學報》第50卷第4期，2013年，10-11頁。

即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為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為太常卿。”⁴⁵明宗祀天南郊為長興元年（930）二月事，當時宰臣馮道為南郊大禮使，趙鳳也在相位上。李愚為承旨學士，因此郊祀後的加恩制理當由李愚草擬。《舊五代史·唐書·明宗紀》長興元年五月辛卯“以翰林承旨、兵部侍郎李愚為太常卿”，正是在郊祀後不久。太常卿就職位而言自然清顯，但從承旨學士遷出則不太尋常，可見《新五代史·李愚傳》敘說的情況是有依據的。有意思的是長興二年三月李愚入相時，命相制特別說他“當祀周郊，密承殷誥。泥金而將期獻頌，擊石而尋致來儀。既歷試諸艱，且爰立作相。是命亞鳳池之貴位，領虎殿之群儒”⁴⁶，特別表彰他在明宗郊祀時寫的敕書有份量，並以此作為他入相的一項條件，這很像是在此事上還他一個公平。李愚的加恩制讓馮道等不滿，估計是特別提到馮道等人的部分。《新五代史·李愚傳》指出是馮道鄙薄李愚的文字，實際趙鳳的不滿可能更關鍵，長興二年李愚入相就是在趙鳳出鎮邢臺的前提下實現的⁴⁷。他和馮道也有類似衝突，但基本還是能共事的⁴⁸。

就家世及政治資歷而言，李愚早有盛名，但仕途卻也是到了後唐纔真正躍起，這一點和馮道等類似。他和馮、趙的衝突可能有身份背景這一因素，一個旁證來自《新五代史·劉岳傳》：

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遺下《兔園冊》爾。”《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祕書監。其後李愚為相，遷岳太常卿。⁴⁹這一故事下文還將涉及。劉岳是中朝名家子，因此看不起出身幽州的鄉儒馮道。李愚則對劉岳有所援助，或許和李愚也有類似劉岳的背景有關。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性格差異和文士相輕等可能。據史傳，李愚和趙鳳都是峻急的性格。李愚也是文章能手，文風深受韓柳古文的影響，而且後唐平蜀時，“軍書羽檄，皆出其手”，從此獲得莊宗的信任⁵⁰。作為宰相的馮道和趙鳳可能不願意李愚這樣一位文字能力強卻不太能與他們配合的官僚為翰林學士之首，借口草制文字不妥而將李愚調離學士院。

後唐是馮道個人事業和聲望奠定的最重要的階段，尤其是在唐明宗的時代。細讀新舊《五代史》以及《冊府元龜》等提供的材料，記錄表彰馮道言論最多的君主也是唐明宗。史官有意識凸顯這一時期馮道的影響力不排除有他們個人的好惡和利益考量，但不能否認的是，種種跡象表明馮道和明宗之間是有相當融洽的君臣互動。甚至在晉高祖天福元年（936）十二月頒佈的以馮道為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的詔書裏，還再次強調馮道在明宗在位期間的貢獻：

自明宗皇帝克紹基扃，仰膺圖讖，於草昧皇靈之際，有攀鱗附翼之功。密贊皇猷，靜司帝誥，出納奉命，周旋八年。持葛秤以定錙銖，浮殷舟而拯沉溺。四時成歲，陰陽畢順於調燮；九德不愆，朝野咸推於表式。⁵¹

⁴⁵ 《新五代史》卷五四，621頁。

⁴⁶ 《冊府元龜》卷七四《帝王部·命相》四，858頁。

⁴⁷ 《舊五代史》卷六七《李愚傳》，893頁；又《新五代史》卷六《唐本紀·明宗》，63頁。

⁴⁸ 見《舊五代史·李愚傳》記李愚與劉昫在正事堂詬罵和同時被免去相位一事。李愚言語中譏諷馮道與劉昫姻親關係；此事發生於清泰元年七月，見《舊五代史》卷四六《唐書·末帝紀》，638頁。

⁴⁹ 《新五代史》卷五五，632頁。

⁵⁰ 《冊府元龜》卷七一一《幕府部·才學》，8553頁；又卷七二一《幕府部·謀畫》，8590頁。

⁵¹ 《冊府元龜》卷七四《帝王部·》四，860頁。

縱觀馮道一生，這也是他對實際政治貢獻最多的年代。在這之後他始終保持著政壇元老的身份，但卻未必有那種持續的影響力。明宗剛即位，馮道就成為新設立的端明殿學士的首任。這一職位自此成為由翰林學士到宰相的重要過渡，礪波護稱之為副宰相，不無道理⁵²。對於馮道的入相過程，《冊府元龜》卷七四《帝王部·命相》四有頗為詳細的記載。當時樞密副使孔循不願河北人入相，於是推舉了出身世家的崔協。權臣樞密使安重晦傾向於孔循的意見，而與孔循不和的平章事判三司任圜則推舉李琪。在僵持不下的情況下，最後明宗提出了韋肅和馮道：

帝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審詳。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人言名家，待我嘗厚。

置於此位，何如？肅苟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為長者。多才博學，與物無競，可以相矣。”書記，即馮道也。嘗為莊宗霸府書記，帝素款顏，偶不記名，但云書記。

根據這些資料，礪波護指出唐末以來，貴族制雖然崩壞，但宰相這樣的職位依然掌握在唐代貴族家族的手中。這次命相推舉出來的崔協、李琪乃至韋肅都是這類人物。因此馮道成為執政完全出於明宗個人的意旨。明宗的考慮主要是兩點，一是馮道的文筆，二是馮道樂天的性格，而此性格與明宗有共鳴之處，所以馮道的入相屬於特殊的機緣⁵³。礪波護的這些分析值得考慮，比如明宗對馮道的器重的確就很關鍵。和馮道擔任河東掌書記一樣，他的入相也是標誌性事件。問題是其標誌性的具體意義為何。上引《冊府元龜》的記載顯然過於戲劇性，以至於不合情理。明宗即位後，馮道立刻從翰林學士昇為端明殿學士，其實入相不過時間早晚。明宗不太可能在商議命相前夕還只記得馮道是河東書記，更可能的倒是明宗早在河東時就和馮道有接觸並產生好感，因此即位後纔如此重視他。其次，端明殿學士一職是在權臣樞密使安重晦建議下設置的⁵⁴，宋敏求告訴我們當時的端明殿學士“班樞密使之後，食於其院”⁵⁵。可見與後唐樞密院的關係尤其密切，其首任人選必定得到安重晦的認可甚至大力支持。儘管史乘宣稱孔循不願河北人入相的意見獲得安重晦的支持，實際情況未必如此。馮道入相固然有個人機遇在內，但明宗選擇馮道和崔協同時入相的做法看起來卻更像是政治上的平衡，也就是選擇了兩個不同群體的代表人物。

礪波護敏銳地注意到天成二年（927）正月馮道和崔協的命相制書中贊譽兩人的文字。形容馮道的部分著意強調兩點，一是家風敦厚、士行無缺，所謂“溫恭為君子之儒，慤厚有大臣之體”；二是倚馬可待的文才。而描述崔協的段落則完全採取描寫晚唐清流門胄的套路：“星辰降彩，軒冕聯榮。禮樂稟於生知，詩書博於時習。輝華繼世，可鄙荀陳。清貴傳家，固超王謝。自登高第，踐歷周行。”⁵⁶有關崔協的記載和他的任官經歷讓人感覺他雖早登科第，實際並不以文辭見著，但他出自晚唐最為清貴的家族之一，近期發現的崔協夫婦的墓誌更讓我們瞭解他的婚姻網絡與中朝名族的密切關係。⁵⁷

⁵² 礪波護《馮道——亂世の宰相》，115頁。

⁵³ 礪波護《馮道——亂世の宰相》，116-119頁。

⁵⁴ 據《五代會要》卷一三（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肆，九州出版社，2004年，2159頁），設立此職位的建議最初來自孔循，為的是協助樞密使安重晦處理明宗即位初的四方書奏。

⁵⁵ 宋敏求《春明朝退錄》上，誠剛點校，中華書局，1980年，13頁。

⁵⁶ 《冊府元龜》卷七四《帝王部·命相》四，857頁。

⁵⁷ 《崔協墓誌》與《崔協妻盧氏墓誌》拓片分別見齊運通《洛陽新獲七朝墓誌》，中華書局，2012年，380、381頁。此處錄文見仇鹿鳴《新見五代崔協夫婦墓誌小考》，載《唐史論叢》第14輯，233-246頁。該文對崔協夫婦墓誌中體現的崔協生平與其家庭的人際網絡等問題均有討論，讀者可以參看。筆者認為，《舊五代史》等正史提到崔協都頗有揶揄，尤其以任圜的“沒字碑”諷刺最為辛辣。細讀墓誌，崔協雖備歷清顯，但走的卻是從度支巡官到給事中一路，並無

如礪波護所言，天成二年制書中以“人柄”對“門第”可以解釋為何馮道在擔任宰相之初受到有門第背景の後唐成員的輕視。的確，除了馮道之外，五代前期的宰相大都有唐代右族名流的背景，但他們並非礪波護形容的那類靠門第維持的“貴族”，而是晚唐通過進士詞科崛起的文學官僚世家。他們和以馮道為代表的來自地方的文儒群體差別並沒有想像那麼大，都是以文學立身。這兩個群體構成了後唐政權文官集團的主體。明宗一朝，五代的政治出現新的朝向。後唐一方面仍以恢復唐朝天下為己任，刻意倣效唐朝的制度禮法，繼續禮遇有中朝世族背景的人士（其中包括大量曾服務於後梁政權的官僚），另一方面大力擢用來地方並長期服務於後唐政權的官員。從他擔任河東掌書記到天成二年入相，馮道已經為後唐政權效力長達 14 年，應該超過了當時許多朝中的高級文官。他的入相標誌著五代人事更替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從馮道的任官經歷和史乘對這些經歷的描述來看，奠定他漫長而成功的政治生涯的核心素質是他長於文誥章表。這也是和他同時獲得後唐重用的趙鳳、劉昫等人的共同特點。比如長興四年趙鳳命相制文說：

丹山瑞彩，赤塵靈鋒。清明猶水鏡冰壺，質厚若渾金璞玉。動惟稽古，靜可鎮時。夢傳五色之毫，文章煥爛；力就三冬之志，學藝縱橫。頃在禁林。嘗傳職業。始中原之大定，屬萬國以來朝，制命聯綿，詔書疊委，共歎立成之敏，略無停綴之時。⁵⁸

命相制書難免有誇大之處，但唐五代的這類重大書寫也有非常強調在文字中精確體現書寫對象的特點，浮泛之詞反而得不到認可。上述制文就不只信口說趙鳳的文彩出眾，而是提供了他不僅草詔敏速且心思綿密的具體證據。“夢傳五色之毫”這樣的譬喻一般也只用於形容天才型文人，而非隨意誇張，這些印象可以通過比較這類書寫而獲得。那麼馮道的文字如何呢？在晚唐五代的王言和表狀箋啓類書寫中究竟達到了到何種水準呢？我們若要對馮道早期仕途所依靠的才能作出更精確的判斷，就必須思考這些問題。幸運的是，馮道的文集雖然未能傳世，但他的個別相當重要的篇章卻因《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的抄錄而得到保存，使我們得以管窺究竟。可惜以往的研究對這類文字都未能留意。關於馮道的文筆，《舊五代史·馮道傳》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其後百僚上明宗徽號凡三章，道自為之，其文渾然，非流俗之體，舉朝服焉。道尤長於篇詠，秉筆則成，典麗之外，義含古道，必為遠近傳寫，故漸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肅然，無澆醜之態。⁵⁹

這裏提到的“上明宗徽號凡三章”即長興元年後唐群臣請上尊號之事。據《舊五代史·唐書·明宗紀》和《冊府元龜》，天成五年唐明宗郊祀後宣佈改元為長興元年，三月丙子、庚辰和癸未，馮道率群臣三次請上尊號。四月戊午，明帝御文明殿受冊徽號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現存馮道所撰的請上尊號表和舉行典禮時的《上唐明宗徽號冊文》，後者為《舊五代史·唐書·明宗紀》全文載錄，說明是公認的馮道的大手筆。此外長興三年六月馮道再次率群臣上表請於明宗尊號內加“廣道法天”四字，其中一篇表文及明宗答詔保存於《冊府元龜》卷一七《帝王部·尊號》中。又後周廣順三年

掌書記或掌誥經歷，更可佐證其不以文字著之記載。任圜的責難恐亦在此點上，不過這只能說明當時對文辭的看重，卻未必表示崔協就無一定的行政能力，明宗選擇他為相，很可能也有這方面的考量。

⁵⁸ 《冊府元龜》卷七四《帝王部·命相》四，858 頁。

⁵⁹ 《舊五代史》卷一二六《馮道傳》，1657 頁。

(953)冬十月甲子，“中書令馮道率百官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答詔不允，凡三上章，允之”。這次的章表出自馮道之手，其中一篇也見於《冊府元龜》卷一七《帝王部·尊號》⁶⁰。這類受到晚唐五代社會上層重視的官方駢儷文字，有其特定時空下的文學評判標準和比照對象，這一點當時的讀者可以很清楚，但對脫離了那一政治文化語境和審美敏感的現代史家來說，往往是個難題。解決這一難題的途徑之一是和唐五代其他同類型文字比較閱讀，盡量找出其文字特色和刻意傳遞的訊息。筆者總的印象是馮道的誥謨文字典郁不失曉暢，平實卻不淺近。比如給明宗的《請上尊號表》中寫明宗的時代：

而況萬邦胥悅，百穀順成。天垂上瑞之文，人樂繇庚之化。雞竿作解，鳳紀維新。野喧擊壤之歌，兵入囊弓之詠。人祇訢合，日月重光。⁶¹

這類句子的確不靠用典而渾成精警。他的《上唐明宗徽號冊文》也同樣少浮泛之腴辭，在不長的篇幅內具體講述明宗李嗣源的文治武功。先是說他戡定內亂，“成再造之業，由四征之功”。接下來再贊李嗣源的修內政和懲外敵。最後說：“非陛下有道有德，至聖至明。動不疑人，靜惟恭己。常敦孝禮，每納忠言。則何以臨御五年，澄清四海。時久纏於災害，民驟見於和平。休徵備載於簡編，徽號過持於謙讓。”⁶² 文章邏輯的嚴密使上尊號顯得合情合理，文字雖是駢儷，卻具備古文的格調，頗有陸贄的文風。

以上的討論旨在說明，作為五代政治文化精英的代表，馮道仕宦生涯的順利一是得益於晚唐以來的清流文化的影響。他的生涯軌跡和當時受重視的衆多文士並無區別，都是沿著晚唐以來文學官僚的典型仕途模式發展；二是得益於特殊的地緣政治的作用，河北尤其是幽州的文武人材被大量吸納入後唐政權之中。這兩種影響他仕途的因素也影響到他個人的社會關係網絡。馮道的私人生活和官場交往都透露出明顯的地域傾向，這種傾向在五代的精英中是否很普遍尚有待深入考察，但至少馮道是這方面的典型。馮道自己的婚姻就說明了這種傾向。根據他的《長樂老自敘》，他先娶德州司戶掾褚瀆女，後娶景州弓高縣令孫師禮之女，結婚對象都是他家鄉人士的女兒。但他子女的婚姻就脫離了這一模式。馮道長女“適故兵部崔侍郎諱衍子太僕少卿名絢”。崔衍在長興年間曾先後任給事中、御史中丞和兵部侍郎⁶³。雖然關於他的記載很少，但從這些職任和他的姓氏判斷，他必定屬於晚唐盛門之後。馮道劉昫的聯姻則不僅是政壇上的聯盟也是鄉黨的聯誼⁶⁴。

他對於來自家鄉的人材也著意提攜。幽州永清人龍敏是河北鄉曲文士的一個類型的代表。史稱其為“儒丐”，說明他早年在亂世中無所依託，直到馮道幫忙引介纔得以獲得政治上的歸屬。《冊府元龜》有段生動的敘述：

⁶⁰ 《舊五代史·唐書·明宗紀》長興元年三月條只提到丙子和癸未兩次請上尊號（561頁），而《冊府元龜》卷一七提到的上表日是庚辰，且錄入馮道擬的表文與明宗的答詔。據表中“先以中外同詞，華夷叶慶，敬遵往制，特上徽號。天倦未回，王言疊降，過持謙柄，尚拘羣情，將永顯於洪休，須再陳於丹素”云云，顯然在此之前已經上過表，或許丙子日就是第一次。

⁶¹ 《全唐文新編》卷八五七，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0817頁。

⁶² 《全唐文》卷八五七，10816頁。

⁶³ 《舊五代史》卷四二《唐書·明宗紀》八長興二年條，583頁；卷四四《唐書·明宗紀》十長興四年條，602頁；《冊府元龜》卷六一《帝王部·立制度》二，684頁。

⁶⁴ 史料未明言馮道與劉昫的聯姻是何種情況。但《長樂老自敘》提到馮道長女嫁崔衍子，其他則“三女早亡，二孩幼亡”，如此則顯然只有一種可能性，既馮道子娶劉昫女。

龍敏，幽州人。少為儒丐，游都邑。莊宗定魏博，敏聞故人馮道為霸府記室，乃客於河中。歲內，歸太原，館於馮道之家。監軍使張承業從容謂道曰：“吾子鄉友南來，何不相見？”遂得通刺。會莊宗在魏州，召道從軍。承業即署敏為巡官，典監軍奏記。⁶⁵

龍敏日後成為唐晉兩朝的高官。他的經歷使他具有縱橫家的風格，史傳說他“術不甚長，彘外柔而內剛，愛決斷大計”，類似於中唐的李泌。另一位得到馮道知遇之恩的人物是王延。《舊五代史》卷一三一《王延傳》：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為儒，善詞賦，會鄉曲離亂，不獲從鄉薦，因客於浮陽，隨滄帥戴思遠入梁。嘗以所為賦謁梁相李琪，琪覽之，欣然曰：“此道近難其人，王生升我堂矣。”繇是人士稱之。尋薦為即墨縣令，歷徐、宋、鄆、青四鎮從事。長興初，鄉人馮道、趙鳳在相位，擢拜左補闕。踰年，以水部員外知制誥，再遷中書舍人，賜金紫。⁶⁶

王廣武認為馮道在五代人物中算是相當純粹的儒者，和他背景經歷很接近的同僚如趙鳳和劉昫等都在人生不同階段受佛道的影響，在馮道身上這種影響卻微乎其微⁶⁷。這一判斷未必準確。出身幽州的名僧可止，曾得到劉仁恭父子的禮遇。劉氏政權覆滅後到定州王處直處躲避。《宋高僧傳》卷七《義解篇·可止傳》：“天成三年戊子，王師問罪，定州陷焉。招討使王晏休得瀛王馮道書，令尋止。既見，以車馬送至洛京。河南尹秦王從榮優禮待之。奏署大師號文智焉，於長壽淨土院住持。”⁶⁸馮道早年在幽州時應已瞭解可止。可止不僅長於佛理，且“百家子史經目無遺。該博之外，尤所長者近體聲律詩”，與出身河北的名臣趙鳳、馬胤孫等都有唱和。馬胤孫曾受韓愈影響，以反佛著稱⁶⁹，而趙鳳也有激烈的反佛舉動⁷⁰，因此可止得到馮道的特別關懷未必一定說明馮道接受了某些佛教的思想。但下面這則事例或許更能用以說明馮道的宗教傾向。《冊府元龜》記載：

（晉高祖天福四年）九月辛卯，召道士崇真大師張薦明，錫以繒帛。薦明，燕人也。少為儒，遊學河朔，漁獵莊老，故性與道俱。其後雲衣星冠，奉自然之教。帝素尚玄元，御極之初，數數召見。（中略）帝遂延入內殿，講老氏《道德經》。召宰臣馮道授卷而聽。道曰：“道士講老子，僧人受戒，令文有之，不可輕也。”帝遂禮之為師，益加崇重。⁷¹

晉高祖特別讓馮道去聽張薦明講《道德經》，就未必只是因為張薦明也是幽州人氏。馮道的勸諫似對佛道二教都表示了相當的尊重。他對道德之學可能也頗有涉獵。流傳於世的馮道抒發人生感慨的詩篇《偶作》中有“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此“道德”一詞就是明顯的道家意味。劉咸忻早就注意到五代到宋初政壇的柔厚之風深受道教清淨思想的影響⁷²，因此馮道謙退的風格有道教的影響是完全可能的。

⁶⁵ 《冊府元龜》卷七二九《幕府部·辟署》四，8680頁

⁶⁶ 此記載又見《冊府元龜》卷九五五《總錄部·知舊》，11231頁。

⁶⁷ 見 Wang Gungwu, “Feng Dao: An Essay on Confucian Loyalty”, pp. 133-134.

⁶⁸ 《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五〇《史傳部》，748頁。

⁶⁹ 《新五代史》卷五五《馬胤孫傳》，630頁。

⁷⁰ 《舊五代史》卷六七《趙鳳傳》，889頁。

⁷¹ 《冊府元龜》卷五四《帝王部·尚黃老》，608頁。

⁷² 見劉咸忻《右書》卷五，收入黃曙輝編《劉咸忻學術論集·哲學編》中，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505-509頁。

馮道仕途的成功固然得益於晚唐核心文化對五代社會和統治集團的影響，但出身為鄉儒的他卻不得不面對中朝子弟的歧視，這恐怕也不是他一個人的經驗。史傳中反覆出現的一個主題就是他與唐代清流家族子弟的緊張關係。上文已經提到選任河東掌書記引發盧程不滿的事件。這裏再舉幾個例子。

《冊府元龜》記載：

（明宗天成）四年二月，車駕自汴還京。至汜水，東都留司官太子少傅李琪等奏曰：“伏以陛下暫違清廟，纔過周星。初平作孽之守殿，次戮不臣之庭琬。今者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城。大振皇威，咸繇睿筭。臣等久違宸極，俱戀聖恩，恨不隨獸舞於汴郊，拜顏龍於梁苑。豈可只於清洛，坐俟迴鑾。願於次舍之間，得展會同之禮。庶傾就望，咸竭歡呼。臣等今乞於偃師東，排班迎駕，稱賀後先赴雒陽東祇候。”奉勅：“契丹即為兇黨，真定不是逆城。蓋闕審詳，有茲差誤。李琪罰一月俸。”先是，定州王都叛命，琪不詳鎮州為真定，誤用之故，及於罰。⁷³

李琪將王都所據的定州（即中山）當成了成德的鎮州，兩地雖相距不遠，性質卻完全不同。而指出這一重要疏失的恰是熟悉河北地理的馮道⁷⁴。又《冊府元龜》載：

（天成）四年八月，太子太傅李琪奉命撰故青州節度使霍彥威神道碑。初，琪仕梁至平章事，而私懷感遇之意。舊之工碑版者，奉勅撰碑，皆始敘君上獎功之道，承詔撰述之旨，每於立意皆稱臣。彥威仕梁位至方面，及茲敘其揚歷，必須指名幾任是偽，幾任是朝命。琪不欲指斥偽梁，所撰碑文，自初不稱臣。中書覆奏云：“李琪所撰霍彥威神道碑文，既不分真偽，是混功名。望令改撰。”從之。⁷⁵

《新五代史》卷五四《李琪傳》明確說李琪《霍彥威神道碑》中的諱飾之詞“為馮道所駁”。這兩件事都發生在天成四年，頗不尋常。李琪絕不缺乏朝廷文字的寫作經驗。他不僅被認為是中朝士族的代表⁷⁶，且從梁太祖之時起就“專掌文翰，下必稱旨，寵遇踰倫。是時琪之名播於海內”⁷⁷。在命相爭議中，推崇李琪的任圜夸他為“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較藝，可敵時輩百人”，連反對他的孔循都不得不承認李琪有“學藝”⁷⁸，在天成年間恐怕是極少數能在屬文名聲上與馮道相侔且過之的詞臣。但《舊五代史·李琪傳》說他長興間“尤為宰執所忌，凡有奏陳，靡不望風橫沮”。馮道指出李琪文字中的那些錯誤看來有要公開羞辱他的目的。這兩件事均發生在天成四年，如果結合長興元年群臣給明宗上尊號的表與冊文都出馮道手筆一事，那麼是否馮道有意在此之前徹底確立自己在朝廷章誥書寫方面的權威地位，就只能讓我們去想像了。

馮道受到中朝士族出身的官僚的輕視，最有名的例子是天成年間任贊和劉岳對他的嘲笑。《冊府元龜》記載：

⁷³ 《冊府元龜》卷一五四《帝王部·明罰》三，1866頁；此事又見《舊五代史》卷四〇《唐書·明宗紀》，548頁。

⁷⁴ 《舊五代史》卷一二六《馮道傳》，1657頁。

⁷⁵ 《冊府元龜》卷五五三《詞臣部·謬誤》，6641頁；此事亦見《舊五代史》卷四〇《唐書·明宗紀》，553頁。

⁷⁶ 見《冊府元龜》卷四一三《將帥部·薦賢》（4912頁）郭崇勳語。

⁷⁷ 《冊府元龜》卷五五一《詞臣部·詞學》，6612頁。

⁷⁸ 《冊府元龜》卷三三七《宰輔部·不協》，3980頁。

馮道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吏部侍郎劉岳以道形神庸陋，一旦為丞相，人士多竊笑。道自月華門赴班，岳與工部侍郎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回顧，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兔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因授岳秘書監，任贊散騎常侍。⁷⁹

此條放在《宰輔部·徇私》，說明在《冊府元龜》的編纂者看來，馮道有點公報私仇的意味。同一記載也見於《冊府元龜》卷九四四《總錄部·佻薄》和卷九三九《總錄部·譏誚》，當然批評對象分別變成了劉岳和任贊⁸⁰。但《總錄部·譏誚》的記載還加入了馮道的回應：

後唐馮道為相，工部侍郎任贊因班退，與同列戲道於後，曰：“若急行，必撲下《兔策》。”道尋知之，召贊謂曰：“《兔策》皆名儒所集，道能諷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為舉業，皆竊取公卿，何淺狹之甚邪！”贊大愧焉。⁸¹

據文中“新相迴顧”云云，此事或發生在天成二年馮道入相不久時⁸²。劉岳屬於晚唐清流重臣劉崇龜、崇望家族的子弟⁸³，任贊估計也有類似背景。兩人又曾同時在朱梁政權擔任翰林學士。《舊五代史·馮道傳》表彰馮道入相後“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置之”，緊接著就敘述了這一事件。可見《舊五代史》的編者認為這一事件必須在馮道“抑浮躁”的脈絡下理解。所謂“浮躁”，就是晚唐以來清流官僚甄別品流的“浮薄”風尚，對此筆者已在另文有所論列⁸⁴。此事件的真正歷史意義並不在於這次交鋒究竟是否如記載這般繪影繪聲地發生過，或如其所言在當時影響了劉岳和任贊的職任，而是實際提供了一個五代人物對唐後期清流文化下存在的兩種身份認知的非常貼切的表達。清流文化雖然以強調文的作用和憑文辭致顯的重要，但這種文化中的成功者不斷將文辭的功能和詞學才能神秘化，以便給自身加上一道光環，這道光環隨著以文辭致顯的官僚家族的形成，更擴展到包括了外表和行為舉止等等外在因素。與此相關的是一種輕視苦學而成的態度，尤其輕視出自承擔中古基層教育義務的地方庠序的人材。孫光憲在《北夢瑣言》裏也記錄了這則事件，並加評語說：

北中村墅鄉以《兔園冊》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兔園冊》乃徐庾文體，非鄙樸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

關於《兔園冊》或《兔園策》的性質，礪波護也有很好的說明⁸⁵，這裏不贅述。其實孫光憲的附加說明固然準確，卻未必就是劉岳任贊嘲笑馮道的真正原因。就實際文學能力的造就和實踐過程而言，劉岳、任贊和馮道應無實質性的差別，但劉岳任贊對這種成功的原因的認知和馮道頗不相同。這裏的《兔園冊》其實是庠序教化的代稱而已，嘲諷的是馮道才學的背景，並暗示出自此種背景的人士眼光和文章的淺陋。馮道的回復也是針對這一態度而發，不僅是為自己辯護，也是要提醒對手文和學的主次關係不能顛倒，這其實也是一種修辭。《舊五代史·馮道傳》在描述了《兔園冊》事件之後，就講

⁷⁹ 《冊府元龜》卷九四四《宰輔部·徇私》，3988頁。

⁸⁰ 《舊五代史·馮道傳》的記載則基本綜合《冊府元龜》各條，但也有意捨棄馮道形貌庸陋這樣的細節。

⁸¹ 《冊府元龜》卷九三九《總錄部·譏誚》，11064頁。

⁸² 劉岳自吏部侍郎轉為秘書監在天成三年八月，而任贊自工部侍郎轉左散騎常侍在天成四年七月己卯，見《舊五代史》卷三九和卷四〇《唐書·明宗紀》，540頁，552頁。

⁸³ 《舊五代史》卷六八《劉岳傳》，901頁。

⁸⁴ 見筆者《唐代的清流文化——一個現象的概述》，待刊。

⁸⁵ 參看礪波護《馮道——亂世の宰相》，123-126頁。

馮道寫的上尊號冊文如何服衆和他對李琪的指正等等，這是向讀者說明馮道最終在唐末五代的精英文化中確立了不可動搖的地位的過程，編纂者對當時文化的把握不可謂不精確。

上述的幾則事例都發生在後唐莊宗和明宗時期，看來並非巧合。後唐正是兩個背景不同的文臣群體同時發揮作用的時期，兩者處於既合作又競爭的狀態。這也是自唐朝崩潰之後，像馮道這樣背景的文士首次得以在具有較大規模的政權中執政，對於有些出自晚唐清流右族的子弟，這自然不是容易接受的現實，但劉岳和任贊對馮道的嘲笑也包涵了前者仍擁有文化和政治的資源。當然即便是劉岳代表的那個清流群體，其成員也並非就在旨趣上保持一致。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政治環境的變化，進入後晉，馮道面對中朝子弟的那種壓力已漸漸消失，他自身也在歷史的記憶中經過了從田里兒的“形神庸陋”到一代名臣的“體貌山立”的塑造過程。

三、馮道的自我認同

馮道能給後人一種在亂世中柔厚與謙退的形象，《舊五代史·馮道傳》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不過這樣的形象一定程度上也倚靠馮道自己的手筆來傳遞。《馮道傳》中全文錄入的《長樂老自敘》正是其中關鍵。作於乾祐三年（950）的《長樂老自敘》展現了漫長生涯之後感恩自足且對身後聲名處之泰然之情懷。文章開首先敘家世，然後備列一生所任職官，接下來陳述自身婚姻與子女情況，最後一部份對平生志業作出評價和期許。對這一篇文字，人們歷來的關注點大都在那最後一部份。這一傾向甚為自然，因為文章前半部仿佛是冷冰冰的履歷表，而最後抒懷的部份纔透露出馮道自己的思緒，彷彿是給自己的蓋棺論定。川合康三先生撰文仔細分析這篇文字，將其與白居易的《醉吟先生傳》做了比較，指出馮道的書寫既有模倣白居易之處又表現出不同的思想⁸⁶。這裏先列出《長樂老自敘》的最後部份和《醉吟先生傳》，以便從川合的討論入手，對《長樂老自敘》的意義作進一步的闡發：

《長樂老自敘》	《醉吟先生傳》
<p>靜思本末，慶及存亡，蓋自國恩，盡從家法，承訓誨之旨，闢教化之源，在孝於家，在忠於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所願者下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以三不欺為素。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事親、事君、事長、臨人之道，曠蒙天恕，累經難而獲多福，曾陷蕃而歸中華，非人之謀，是天之祐。六合之內有幸者，百歲之後有歸所，無以珠玉含，當以時服斂，以籩簠葬，及擇不食之地而葬焉，以不及於古人故。祭以特羊，戒殺生也，當以不害命之物祭。無立神道碑，以三代墳前不獲立碑故。無請諡號，以無德故。又念自實佐至王佐及領藩鎮時，或有微益於國之事節，皆形於公籍。所著文章篇詠，因多事散失外，收拾得者，編於家</p>	<p>醉吟先生者，忘其姓氏、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為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地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千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游；游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明之為酒友，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邱壑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韋布之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為之先拂酒壘，次開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p>

⁸⁶ 川合康三《馮道〈長樂老自敘〉と白居易〈醉吟先生傳〉——五代における白居易受容》，《白居易研究年報》3，2002年，1-19頁。

集，其間見其志。知之者，罪之者，未知衆寡矣。有莊、有宅、有羣書，有二子可以襲其業。於此日五鼎，日三省，尚猶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師長、為夫、為父，有子、有猶子、有孫，奉身即有餘矣。為時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歷職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耶！老而自樂，何樂如之！時乾祐三年朱明月長樂老序云。

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醕酌而後已。往往乘興履及鄰，杖於鄉，騎游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飲酌，盡興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日賦詩，約千餘首；日釀酒約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侄，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萬錢，傾財破產，以致於妻子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煉鉛燒汞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弟子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飽於伯夷，樂於榮啟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余何求哉？若捨我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吟罷自哂，揭甕撥醕，又飲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為醉吟先生。於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川合指出，《長樂老自敘》中強調的讀書飲酒之樂和長壽帶來的幸福感恰是《醉吟先生傳》等白居易晚年詩文的主題之一，而後者當然是承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的傳統而來。馮道文中的“老而自樂，何樂如之”之語更是套用白居易晚年所作之《老熱》“何人不衰老，我老心無憂”之句。這些都是白居易詩文在五代文人圈中影響益為顯著的例子。川合也注意到《容齋三筆》中洪邁將《長樂老自敘》與王溥在宋初所作《自問詩序》合觀。洪邁指出兩者在旨趣上的相類，即均以歷事數朝，位極人臣為“儒者之幸”。川合指出，《長樂老自敘》和《醉吟先生傳》雖有表面的相似，兩者的區別也明顯。《醉吟先生傳》體現的是那種不受仕宦等俗務羈絆的曠達自適，當然我們可以說這也許是白居易的一種自我營造，因為他實際已功名成就。但至少從文字看，白氏強調的是種真正意義的超脫，但《長樂老自敘》表現出那份“自足感”則完全來自於那種白居易要擺脫的俗務的充分實現，整篇文章

透露出一種誇耀，和白居易文字的境界相差頗大。川合康三的這些分析自然有見地，但《長樂老自敘》透露出來的思想尚有值得申論的地方。

首先，馮道筆下流露出的滿足感的確有世俗的一面，但這種世俗意味恰恰是當時對儒者的一種期許，也就是說這是以入世為目標的儒者需要達到的境界，當然這個境界入宋後起了根本的變化，但在五代宋初恐怕還是很有代表性。若筆者的這個看法能成立，則馮道的書寫不能僅僅從一種自然主義式的角度去判斷，因為他很可能也是在照著當時的這種理念去塑造自己，雖然他的素材可以說是現成的，無需添油加醋。前面提到的王溥的《自題詩序》已經把這種境界稱為“儒者之幸”。更清楚的說明則來自宋祁《宋景文公筆記》下“庭戒諸兒”條：“吾世為儒，今華吾體者衣冠也，榮吾私者官祿也，謹吾履者禮法也，睿吾識有詩書也。入以事親出以事君，生以養，死以葬，莫非儒也。”⁸⁷ 有意思的是宋祁雖然和歐陽修一起造成對馮道評價的大逆轉，但他筆下的理想的儒者生涯和馮道基本一致。

馮道選擇乾祐三年（950）69歲撰《長樂老自敘》當與臨近七十這一古來高壽標誌有關，但文中提及的安葬諡號等的指示都是指身後安排。所謂祭不殺牲，不立神道碑，不請諡號等等其實是姿態性的，馮道不可能不清楚這實際上不會發生，比如馮道死後即獲得“文懿”的諡號。這裏他以遵循古來所謂薄葬不立碑表等的傳統來表現沖晦的美德。無獨有偶，宋祁在這一點上也和馮道的表達十分接近。《宋景文公筆記》下“治戒”條曰：

吾歿後，稱家之有亡以治喪。（中略）掘冢三丈，小為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水二盎，酒二缸，右置米麵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鞞履自副。左刻吾誌，右刻吾銘，即掩壙，惟簡惟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可著數人，故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以請諡有司，不可受贈贈，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樹五株柏，墳高三尺，石翁仲獸不得用，蓋自標置者，非千載永安計爾。⁸⁸

宋祁的指示和《長樂老自敘》一樣，都是一種修辭，不能當作實錄。但馮道這麼汲汲於身後安排，我們有理由推測《長樂老自敘》其實是一篇自撰墓誌。文中提供的家世、官爵和子女婚宦都體現出墓誌書寫的特徵，文末“時乾祐三年朱明月長樂老序云”中的序正是“墓誌銘並序”的“序”。在新出晚唐墓誌裏，筆者找到兩個強有力的佐證。一是盧繪自撰的《盧繪並前妻李氏合祔墓誌自敘》，標題中的自敘和《長樂老自敘》一致⁸⁹。二是晚唐重臣崔慎由的自撰墓誌。崔慎由自撰墓誌的書寫結構與《長樂老自敘》幾乎一致，開頭曰：“慎由字敬止，代為清河武城人”。接下來先列其祖上四代之情況，然後巨細靡遺羅列出一生所任職官，再是妻子情況。自撰文字的最後部分說：

嗚呼！效不焯於時，行不超於人，而入昇鈞台，出奉藩寄。備踐華顯，僅二十載。其為倖也，不亦久且甚耶。處心行己，始卒善否，則有則有僉議與史官之直筆，在吾何敢逃，吾何敢云。即用為誌，而且刻之墓前，以表於外。⁹⁰

⁸⁷ 宋祁《宋景文公筆記》，儲玲玲整理，《全宋筆記》第1編第5冊，大象出版社，2003年，69-70頁。

⁸⁸ 《宋景文公筆記》，70-71頁。

⁸⁹ 《大唐故宣德郎前守蘇州海鹽縣令繪並前妻故隴西李氏合祔墓誌文自敘》，《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三秦出版社，2006年，373頁。

⁹⁰ 《唐太子太保分司東都贈太尉清河崔府君（慎由）墓誌自撰》，《全唐文補遺》第5輯，三秦出版社，1998年，43-44頁。

這段話和《長樂老自敘》最後一段的表達神似，再結合前面的履歷表式的結構，《長樂老自敘》就像是崔慎由自撰墓誌的一個翻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家世背景而言，馮道與晚唐出自最為清貴的家族的崔慎由相差不可以道里計。馮道寒士出身，他的先人只因他的仕途通達而獲取贈官，然而《自敘》開頭卻說：“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長樂二郡，歷代之名實，具載於國史家牒。”這顯然是誇大的說法，但根據這一表述，再結合其自敘的整體結構，我們可以認為馮道此時已經完全將自己放置於中唐以來在政治文化中獲取空前成功的世家之列。其實伴隨這一過程，士人圈對馮道的評價也愈發趨向於視其為一代名臣。前文討論的《兔園冊》事件中說馮道因“形神庸陋”而被中朝子弟嘲笑，而到了宋僧文瑩《玉壺清話》裏則成了“德度凝厚，事累朝，體貌山立”的新想像⁹¹。

上面的分析旨在說明，《長樂老自敘》一面刻意營造自身形象，一面對晚唐以來中朝士族的主流價值觀作出實際的認同。結合前文討論過的他與盧程、劉岳、任贊等人的隔閡，《長樂老自敘》中的自況也說明了現實和心理認同上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舊五代史·馮道傳》末特別提到馮道的次子馮吉“尤恣狂蕩，道不能制。識者以其不終令譽”。自中唐後，中朝士族自我延續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讓其子弟憑藉文學聲望沿清途扶搖而上。《馮道傳》為何獨獨要舉出馮吉的例子關鍵或在於此。《長樂老自敘》中列出馮道的六子中，除第四子早夭，其他五子均有仕途生涯。前三子從任職看均為清途文官，但據《自敘》，長子馮平與三子馮可早在乾祐三年之前即已去世，而第五子馮義“自祕書郎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衙內都指揮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左春坊太子司議郎，授太常丞”；第六子馮正“自協律郎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節度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太僕丞”。這兩人起家雖是清職，最終走的應該是武職的軌道，顯然不是以文才顯。這樣馮吉就成了唯一有希望延續馮道家族文學官僚特徵的人物。《宋史·文苑傳》有《馮吉傳》：

馮吉字惟一，河南洛陽人。父道，周太師、中書令，追封瀛王。吉，晉天福初以父任祕書省校書郎，遷膳部、金部、職方員外郎，屯田、戶部、司勳郎中，累階金紫。周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吉嗜學，善屬文，工草隸，議者以掌誥許之。然性滑稽無操行，每中書舍人缺，宰相即欲用吉，終以佻薄而止。雅好琵琶，尤臻其妙，教坊供奉號名手者亦莫能及。父常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忤色，家人皆大笑。及為少卿，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宋初，受詔撰述明憲皇太后謚議，見稱於時。建隆四年，卒，年四十五。⁹²

馮吉傳內容雖不算豐富，但已提供此處分析所需的幾點關鍵信息。馮吉如當代人預期那樣“善屬文”，因此也如預期那樣“議者以掌誥許之”。他前期的郎官職位也確實是朝著此方向邁進，但傳中說他終因舉止愛好被視為“佻薄”而與中書舍人這一關鍵的詞臣位子無緣。傳中提到馮吉遷太常少卿

⁹¹ 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二，鄭世剛整理，《全宋筆記》第1輯，98頁。

⁹² 見《宋史》卷四三九，13016頁。該傳中部份記載亦見陶岳《五代史補》卷五“馮吉好琵琶”條。該條記載馮道因馮吉好琵琶而感嘆“百工之司藝而身賤，理使然也。此子不過太常少卿耳”。這當然是撰者以後見之明而做的渲染，但由此亦可見太常少卿在五代文臣心目中的位置，這與晚唐以來的看法一致。見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伍，2532-2533頁。

在顯德中，此時馮道應已去世。太常少卿一般由禮制專家擔任，雖也算清要之列，卻非詞臣的理想之進途。這一官位表面看來頗合馮吉“嗜學”特點和他家世為儒的身份，實際卻阻斷了他成為詞臣的希望，這一點對包括馮吉在內的當時熟悉任官制度的士大夫來說不可能不清楚，難怪馮吉要“頗不自得”而以酒自娛。這一任命可能不只是朝野對馮吉個人言行的看法導致的結果，或許也受到後周初馮道地位的微妙變化的影響。漢周鼎革之際，馮道雖然貴為中書令兼門下侍郎，後又兼太師，名義上依然文臣之首，卻不是後周君主最親信的大臣。王禹偁《五代史闕文》載：

又周祖自鄴起兵赴闕，漢隱帝兵敗，遇害於劉子陂。周祖入京師，百官謁，周祖見道猶設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時周祖兼侍中。周祖氣沮，故禪代之謀稍緩。及請道詣徐州，冊湘陰公為漢嗣。道曰：“侍中由衷乎？”周祖設誓，道曰：“莫教老夫為謬語，令為謬語人。”臣謹按周世宗朝詔史臣修《周祖實錄》，故道之事所宜諱矣。⁹³

這段記載多少說明馮道並非漢周禪代的積極擁護者，但太祖尚須倚重馮道的聲望，比如廣順三年二月周太祖制象徵皇帝權威的國寶兩坐，詔馮道書寶文⁹⁴。到了世宗即位，馮道恐很快被邊緣化，據《冊府元龜》記載：

周世宗顯德元年正月即位。二月丁卯，河東賊將張揮率前鋒自團栢谷入寇，營於梁候驛，攻劫堡柵，殺掠焚燒，所至盪盡。潞州李筠遣護軍穆令均率步騎千人拒之。時帝議親征，詢於執事者。中書令馮道等奏曰：“劉崇自平陽奔遁之後，勢弱氣奪，未有復振之理。竊慮聲言自來，誘語於我，兼以陛下纂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搖動，不宜輕舉。命將禦寇，深以為便。”帝曰：“劉崇幸我大喪，聞我新立，自謂良便。必發狂謀，誑惑人心。勾誘北虜，謂天下可取，謂神器可圖。此際必來，故無疑爾。”時馮道以帝銳意於親征，恐非萬全之策，因固諫之。帝曰：“昔唐太宗創業天下，草寇靡不親征，朕亦何憚焉？”道曰：“陛下亦不可效太宗帝。”又曰：“劉崇烏合之衆，首遇王師，必如山壓卵爾！”道對曰：“山壓卵固不敵，不知陛下終作得山定否？”帝不悅而罷。三月癸未，帝降御札親征。⁹⁵

這一記載亦見《舊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紀》及王鞏《聞見近錄》等文獻，征討劉崇固然是場惡戰，但世宗即位之初銳意進取和這場征伐的勝利相形之下一定會使十分持重的老臣馮道不如范質、王溥、陶穀這些後進的人物來得有影響力了。馮道去世時，王溥纔 33 歲，竟然已是中書侍郎、平章事⁹⁶。當宋開寶年間薛居正等修成《舊五代史》時，以特定的仕進模式作為清流家族延續的標誌的觀念依然深植人心，主要編撰者又多有得到馮道提攜的人物如李昉等。《馮道傳》特別提到馮吉而不及其他子弟並非偶然。能保持馮氏詞臣家族特色的希望僅存於馮吉，強調馮吉在這一點上的挫折實際暗示了馮道家族地位的終結。

代結語：宋代的餘音

⁹³ 《五代史闕文》，《五代史書彙編》肆，2458 頁。

⁹⁴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周書·太祖紀》，1490 頁。

⁹⁵ 《冊府元龜》卷五七《帝王部·英斷》，639-640 頁。

⁹⁶ 比如王溥就極力支持周世宗親征，見《宋史》卷二四九《王溥傳》，8800 頁。

顯德元年（954），楊凝式與馮道先後逝去，楊終年八十二，馮七十三。這兩人代表著全然不同的兩個群體，處世作風則是異中有同。自唐末到五代，他們政治地位的屹立不倒，除去個人因素，最重要的緣由是他們都受惠於同一種政治文化提供的保障，而並非靠著不斷改換門庭⁹⁷。楊凝式來自楊收家族，且是宰相之子，而陳寅恪早已指出，楊收是“唐末五代之世家”。這樣的世家實際憑藉的是文藝而非族望。劉咸炘也注意到了這一現象，指出這些所謂門閥，“實已非唐之門閥”，而是晚唐始盛⁹⁸。馮道雖更無門第可靠，他的生涯是這一主流文化生命力的另一種證明。他們兩人同一年離去純然巧合，但也標誌著在唐末大亂中度過成年歲月的北方重要文臣，除了兩年後去世的王仁裕和開寶四年去世的大儒田敏，都已退出了歷史舞臺。

馮道對宋初文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首先，通過像他這樣的士人，唐中葉以後保存於河北地區的儒文化對唐代的政治文化進行了滲透和改造，這必然是個潛移默化的過程，諸多細節已湮沒無聞，但其蹤跡仍有可循之處，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眾所周知的馮道奏請校勘和刻印《九經》。《五代會要》載：

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廣為抄寫，仔細看讀，然後僱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請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蓋刻板之流行，實始於此。

又《舊五代史·馮道傳》：“時以諸經舛繆，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為印板，流布天下，後進賴之。”馮道是促成這個項目開啓的關鍵性人物之一⁹⁹。從負責人的推選到經費的安排都有他的貢獻，《冊府元龜》記載：

周馮道仕晉高祖為相時，尚書左丞判國子監事田敏長於詩賦。道重敏，嘗從客白晉祖曰：

“臣所為官合授於敏，臣不敢黨蔽也。”¹⁰⁰

這條記載中田敏的官職似有誤¹⁰¹，但田敏為馮道所器重則無疑。這樣的項目的經費來源是“政事堂廚錢及諸司公用錢，又納及第舉人禮錢以給工人”¹⁰²。這一安排也應是執政馮道的決定。關於這一項目的經過，邵晉涵《舊五代史考異》已有所論列，為學界熟知。從發起到周廣順三年六月工程完畢，印版製作前後經歷三朝二十多年。伴隨這一過程是馮道和田敏的仕宦生涯的順利延續。田敏接受這項使命時是後唐的國子博士，完成時不僅是後周的尚書左丞，且被公認為“文儒之領袖”、“後學之宗師”¹⁰³。連對五代事務甚少稱許的《資治通鑑》也給予“雖亂世，九經流布甚廣”的評價¹⁰⁴。可見五

⁹⁷ 賈晉華、傅璇琮《唐五代文學編年史·五代卷》，464-465頁。

⁹⁸ 見劉咸炘《右書》卷六下，607頁。

⁹⁹ 王廣武認為此事上馮道的貢獻可能有限，更關鍵的推動者可能是同時為相的李愚，馮道只是因為恰巧在執政的職位上而已，見“Feng Tao: An Essay on Confucian Loyalty”，p.135。這一說法比較牽強，不僅沒有任何有說服力的直接證據，也沒有充分估計到以下兩點：（1）這一項目本身持續時間很長，貢獻並不僅僅在說服朝廷開啓這一項目，而是整個過程中的支持。李愚死於後唐清泰二年；（2）馮道對田敏的器重也有較為明確的記載。

¹⁰⁰ 《冊府元龜》卷三二四《宰輔部·薦賢》，3833頁。

¹⁰¹ 據《舊五代史》卷八〇《晉高祖紀》六，高祖天福六年甲子，“國子祭酒田敏以本官兼戶部侍郎”。漢乾祐中拜尚書右丞。周廣順元年田敏再從尚書右丞轉為左丞，見《宋史》卷四三一《儒林·田敏傳》，12819頁。

¹⁰²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學校部·刊校》，7305頁。

¹⁰³ 這些形容見《冊府元龜》卷六〇八《學校部·刊校》（7305頁）載顯德二年二月中書奏請委任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校勘《經典釋文》並造其雕版事。又顯德五年詔書裏也稱他為“儒學之宗師”，見《宋史》卷四三一《儒林傳》，12819頁。

代雖然是一個動盪的時代，這樣的文化項目卻能有条不紊得持續。若無馮道和田敏這樣深受儒學影響的文臣的地位的穩固，是難以想像的¹⁰⁵。而這種延續性相當程度上也是晚唐五代清流文化所帶來的結果，馮道的影響是在晚唐五代的清流文化中加重了儒學的色彩。

馮道對宋初文化造成影響的第二個方面可能更重要，但對史家來說也更難描摹，這就是他和宋初統治精英中不少成員的私人關係，這種私人關係既是特殊的地緣政治，也是他個人生涯造成的。本卷《唐研究》中譚凱（Nick Tackett）的文章也從其他方面說明，宋初進入以河南為中心的政治核心區域的官僚群體裏，河北出身的人士佔據了相當高的成份。正如馮道生活在一個統治精英，特別是清流士大夫轉換身份延續其地位和影響力的時代，宋初的政治群體也具有類似的延續性，其代表性文臣可以說正是從馮道這一系統出來。雖然上文的分析說明馮道之經歷絕非偶然，但其政壇生涯的漫長和成功使其自然成為不少宋初名臣的提攜者。他們也必然用不同方式回報。名臣呂端就是一例：“故相馮道，鄉里世舊，道子正之病廢，端分奉給之。”¹⁰⁶

關於馮道對宋初精英文化的影響，民國的劉咸忻在《右書》中有精到的評論：

太祖所用范質、王溥乃馮道、和凝諸人之傳衣鉢者。馮道有《長樂老自敘》，王溥有《自問詩敘》（均見《容齋三筆》），此諸人沿唐人之習，大抵以柔厚保位。吳處厚《青箱雜記》最能表其風氣。其書頗辨道之非依阿。又處厚論心相三十六善，相人取豐肥有福，論文尚朝廷臺閣之文，溫潤豐縟，正謂官樣與富貴氣者，皆此一派之傳也。處厚書又載道詩及張齊賢《自警詩》及《邵氏聞見錄》載質戒子孫詩，旨意略同，皆主張寬厚謹慎，所謂格言入於鄉原者也。又言於詩愛白樂天，又愛馮瀛王。此足見北宋初詩之多宗白及《擊壤》一派所由起之故。宋初人多稱馮道，雖以石介之好詆，亦謂五代大壞，瀛王救之，《青箱雜記》稱馮道，《東軒筆錄》謂王荊公雅愛馮道，謂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能改齋漫錄》謂富鄭公蘇黃門以大人稱道，《晁氏客語》謂道功高而名節非也，當以管仲比。

他又說：

真宗以前及仁宗初年，士大夫論治則主舊章，論人則循資格，觀人則主祿命，貌以豐肥為福，行以寬厚為尚，言以平易為長，文以縟麗為美，修重厚篤謹之行而賤振奇駢馳之才，乃至論文主館閣體，論詩主白居易，其習蓋出於中唐士大夫及五代馮道，和凝諸人，大抵唐之餘也。¹⁰⁷

劉咸忻對於五代宋初的政治文化風氣有細緻的觀察，雖然他強調的是官僚文化中保守持重的一面。他將馮道與和凝並列為對宋初政治文化影響最大的五代名臣也很有見地。這兩人都擁有晚唐以來清流精英最強調的素質—詞學之才。正史裏和凝的形象較諸馮道更接近晚唐的清流之士，但他們兩人在風貌上和晚唐“浮薄”的清流仍有相當大的不同。和凝的箭藝超群，馮道則子弟從文從武均有，可以說都是

¹⁰⁴ 《資治通鑑》卷二九一，9495頁。

¹⁰⁵ 《冊府元龜》卷六〇八《學校部·讎嫉》：“周樊倫為國子司業，太祖廣順末，尚書左丞田敏判國子監獻印板九經。書流行，而儒官素多是非，倫乃掇拾舛誤，訟於執政。又言敏擅用賣書錢千萬，請下吏訊詰。樞密使王峻素聞敏大儒，佐佑之。密訊其事，構致無狀。然其書至今是非未息。”（7308頁）這一事件的是非曲折當然今人無法判斷，但這條記載提到周初權臣王峻對田敏的敬重則值得注意。

¹⁰⁶ 《宋史》卷二八一《呂端傳》，9517頁。

¹⁰⁷ 劉咸忻《右書》卷五，501-502、505頁。

典型唐後期清流官僚基本不具備的特點。相比晚唐清流，馮、和的行政和處世能力要強得多，¹⁰⁸人際網絡也更加廣泛，因此能促成更大的凝聚力，這些恐怕只有當時親身接觸過他們的人纔能有深切的體會。宋代有關馮道的爭議恐怕不僅僅是道德觀念引起的，還有對大臣角色的不同認知這一層因素在內。¹⁰⁹為馮道辯護的往往是以實際政治的經驗作考量，強調的是個人的器量和能在紛亂變幻之中保持內心平靜的素質。在這點上馮道成了一種象徵。《舊五代史·馮道傳》一開始就描繪的鄉儒馮道“唯以披誦吟諷為事，雖大雪擁戶，凝塵滿席，湛如也”，正是這種素質的最動人的寫照。¹¹⁰王安石這樣銳意進取的士大夫會對馮道尊敬有加，恐怕原因也是在此。而批評馮道的則更多從道德原則出發，強調的是超越具體場景的道德政治的終極意義。五代以來的忠的觀念更強調仕事中遵循儒家觀念，而非以和某一政權相始終作為標準，所以服務的對象可以變換，但信奉的施政理念則一以貫之。出身幽州的五代良吏劉審交死後，曾為其僚佐的馮道撰文悼念，語詞懇切，文中說：“今天下戎馬之後，四方兇盜之餘，杼軸空而賦斂繁，人民稀而倉廩匱，謂之康泰，未易輕言。侯伯牧宰，若能哀矜之，不至聚斂，不殺無辜之民，民為邦本，政為民本，和平寬易，即劉君之政安足稱耶！復何患不至於令名哉！”¹¹¹這段寫於乾祐二年（949）的話說明馮道對他所處的時代有相當清醒的認識，並提供切實的理想。

歐陽文忠在《新五代史》中對馮道大加撻伐，認為人不知廉耻，則無所不為，“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他甚至說：“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¹¹²歐陽修竟認為忠義尚存於武人而不存於披儒服者，這當然是一種出自道德原則的表達，但也說明他無視晚唐以來文武兩個群體，至少在其最上層，權力的基礎截然不同。即便是現代，對馮道現象的誤解很大程度上也是基於對五代的複雜多元缺乏重視，於是將馮道看作一位始終被動適應時代的人物，而不是一位擁有巨大無形資源的人物。五代的政治文化精英，即便在具體成員的來源上和晚唐大有不同，仍然具有一種超越具體政治的影響力和地位。晚唐以來的清流的光環并未消失。他們既是唐後半葉以來形成的社會想像的受益者，也為五代社會提供了一種延續性。其實從仕進的模式而論，馮道的生涯并不顯得有多麼特殊。和他一樣在五代經歷多朝、地位不斷上昇的高級文臣比比皆是。也許正因為這是一種普遍現象，歐陽修纔需要將馮道特別作為攻擊的靶子。倘若馮道真的只是個別現象，那這個靶子就缺少了真正的代表性。如果說在晚唐，主流政治文化更多地體現出一種排他性，那麼在五代，同樣這種文化體現更多體現出的是包融性和靈活性。馮道成長的世界曾處於這種政治文化的邊緣，但這種文化的包融性使他成為其中重要的一員，並反過來對這一文化加以改造。這種雙向的變化恰恰是五代社會對中國歷史做出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¹⁰⁸ 鄧小南已經從不同角度探討過五代宋初的文人政治，指出當時吏干型文人受到重視。見《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聯書店，2006年，123-133頁。

¹⁰⁹ 有關北宋對馮道的評價，亦可參看路育松《從對馮道的評價看宋代氣節觀念的嬗變》，《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122-128頁。

¹¹⁰ 《晉書》卷九《太宗簡文帝紀》：“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為意，凝塵滿席，湛如也。”這裡刻劃的正是以清談著稱的晉簡文帝的澄澈之風。《馮道傳》的這段書寫正是暗仿這一描寫。

¹¹¹ 《舊五代史》卷一〇六《劉審交傳》，1394頁。

¹¹² 《新五代史》卷五四《雜傳》，611頁。

刊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 19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 12 月